



4 视觉世界

河南博物院黄釉扁壶

丝路乐舞的千年回响

古花卉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之间融合、交流与对话之路，音乐文化是其中的重要乐章。丝绸之路沿线的音乐文物，则是东西方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物质载体，承载着无数创造者用智慧谱写的心灵和声。河南博物院收藏的黄釉扁壶，正是这段丝路乐章中的灵动音符。透过这件文物，我们得以聆听千余年前丝路乐舞的回响。

器上胡腾 舞影翩然

河南博物院藏黄釉扁壶是一件北齐时期的铅釉陶器，1971年在河南省安阳范粹墓出土。墓主人范粹为北齐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壶体通高约20厘米、宽16.5厘米、口径5.1厘米，呈扁圆杏核状，上窄下宽，敞口短颈，两肩各有一穿孔。通体施黄釉，釉色莹润，类似金银锤制的凸凹效果。

壶腹两面模印着相同的胡腾舞图案：画面中央的舞者起舞于莲座之上，右臂高举前伸，左臂下伸，掌心向后，双足腾跃，反首回望。舞者左侧，一人打拍，一人吹笛；舞者右侧，一人击鼓，一人弹琵琶。五人皆高鼻深目，头戴蕃帽，身着窄袖长衫，腰间系带，足蹬半筒高靴，是典型的西域人形象。黄釉扁壶的装饰纹样有游牧民族马背皮革的风格，壶腹图案说明胡腾舞在北朝时已风靡于世，与壶身的联珠纹、忍冬纹、莲座等装饰纹样一同体现着外来文化的影响。

胡腾舞是从中亚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传入中原的一种男子独舞，因舞姿多以腾身跳跃为基调而得名。胡腾舞的表演者多为高鼻深目的中亚人，起舞时，舞者伴着明快活泼的音乐绕圈急行，结合跳跃、扭胯、提腰和急促的腾踏等动作，舞步变化多端，时而刚毅奔放，时而柔软潇洒，颇具观赏性。在丝路沿线出土的北朝至唐代文物中，胡腾舞者的形象大量出现，如宁夏固原北朝时期的绿釉扁壶、甘肃的唐代鎏金铜胡腾舞俑、山西太原隋代虞弘墓的石椁上的乐舞图、陕西西安苏思勖墓唐代乐舞图壁画等，时人对这一舞种的喜爱可见一斑。

唐诗中也有不少描写胡腾舞的作品。例如，唐代诗人刘言史在《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中作了生动描述：“石国胡儿入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纆（dié）胡衫双袖小……跳身转毂空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四座无言皆瞪目，横笛琵琶遍头促。乱腾新毯雪朱毛……”诗句将胡腾舞者急速腾跳、脚步翻飞、腾跃旋转、弄脚缤纷的舞姿与高超技巧写得惟妙惟肖，仿佛可见舞者锦靴翻踏、宝带作响，身影在席间旋转如风；四座宾客屏息凝神，横笛琵琶急促相和，一派乐舞助兴、觥筹交错的宴饮盛景跃然眼前。

西域乐舞 东渐中原

自汉代张骞凿通西域，中原地区凭借四通八达的地理优势，逐渐成为多民族、多元文化碰撞与交汇的舞台。特别是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统治者对外来商旅多持欢迎与鼓励态度，来自西域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国的使臣、僧侣和商人纷纷入华，粟特人亦在其中。在《洛阳伽蓝记》的记载中，“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西域人络绎不绝地来到边塞，不少人因喜爱中原的风土人情而定居洛阳，逐渐形成规模不小的外来族群。中原与西域的交流日益频繁，通过使臣往来、商贸活动、婚聘迁徙、宗教传播等多种途径，丝路沿线各民族音乐文化在西渐与东传中奔涌交汇。随着中原周边民族内迁，龟兹、疏勒、西凉、高昌等国的西北民族音乐，以及天竺、安国、康国、高丽、悦般等外来音乐陆续传入中原。其中，西域乐舞热烈奔放的艺术风貌与中原文化含蓄典雅、温柔婉约的审美气质形成鲜明对比，其独特魅力迅速赢得宫廷与民间的喜爱，一时使欣赏胡舞胡乐成为社会风尚。

北朝时期，胡乐之律、器、舞、调，曲在宫廷与民间均盛行一时。北周时期，西域诸国大乐汇聚长安，北周宫廷大乐多出自西域。一批才艺出众的西域乐人受到统治者的礼遇，例如北齐时期，胡人乐工曹僧奴、曹妙达父子“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并获开府封王。到了隋代，《西国龟兹》《齐朝龟兹》《魏龟兹》三个乐部盛行长安，受到宫廷和民间的喜爱，西域乐舞广为流传。

北周时期，西域音乐家苏祇婆将龟兹音乐“五旦七调”宫调理论传入宫廷。隋代音乐继承魏晋南北朝音乐成就，建立了“七部乐”“九部乐”的音乐体制，当时的著名音乐家郑译、万宝常以苏祇婆调式理论为基础，发展出八十四调音乐理论，形成一个完整的调式理论体系。唐代朝廷特设音乐机构“教坊”，以中原民间音乐为基础，并借鉴西域音乐创制新声，出现多种新的乐器组合形式。《乐府杂录》记载，唐代乐器约300种，广泛应用于西凉乐、高昌乐、龟兹乐等乐曲之中。唐代承继汉魏六朝的清乐传统，融汇西域各地音乐文化精华，逐渐形成兼具声乐、器乐、歌舞、百戏等多种形式的隋唐燕乐，为中原乐舞谱写新的篇章。

与此同时，来自异域的音乐文化也丰富了文人雅士的艺术创作题材。唐诗中描写西域乐人、乐舞与乐器的作品不可胜数，其中不乏名篇力作，如白居易的《琵琶行》《胡旋女》、李贺的《李凭箜篌引》、李端的《胡腾儿》等。诗人或写琵琶声如急雨繁弦，或写胡旋舞回环如风，异域乐舞的节奏与情调化作诗意的声响与流动的画面。西域乐舞的律动为中华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激发更强的艺术张力。正如唐代诗人李颀在《听安万善吹笛（bi）箎（li）歌》中所写的：“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短短数句既点明乐器的来历，也写出了乐声传入中原后愈发奇妙动人的艺术魅力。

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与国家，通过丝绸之路实现了交流、融汇与包容。经由丝绸之路的文化视野，并逐渐为中原乐舞所吸纳、融合，丰富了中原古代音乐舞蹈文化，使异域乐舞最终融入中华乐舞文化，成为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同时，中原人在不断的迁徙与交流中，也将自身的音乐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域。黄釉扁壶作为东西方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物，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文化气度，以及海纳百川的文化自信。



隋唐乐舞 融汇新声

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地区、国家间文化传播与发展的不竭源泉。隋唐时期，外来乐器与乐舞不断传入，与中原传统乐器相互交融、影响。在继承秦汉音乐传统的基础上，中原音乐大量吸收西域音乐精华，逐渐实现本土化发展。这一时期中华文明开

放、包容的姿态，促进了西域乐舞与中原及各民族乐舞的相互融合，改变了中国乐舞艺术既有的形态，也促进了隋唐音乐的繁荣。

北周时期，西域音乐家苏祇婆将龟兹音乐“五旦七调”宫调理论传入宫廷。隋代音乐继承魏晋南北朝音乐成就，建立了“七部乐”“九部乐”的音乐体制，当时的著名音乐家郑译、万宝常以苏祇婆调式理论为基础，发展出八十四调音乐理论，形成一个完整的调式理论体系。唐代朝廷特设音乐机构“教坊”，以中原民间音乐为基础，并借鉴西域音乐创制新声，出现多种新的乐器组合形式。《乐府杂录》记载，唐代乐器约300种，广泛应用于西凉乐、高昌乐、龟兹乐等乐曲之中。唐代承继汉魏六朝的清乐传统，融汇西域各地音乐文化精华，逐渐形成兼具声乐、器乐、歌舞、百戏等多种形式的隋唐燕乐，为中原乐舞谱写新的篇章。

与此同时，来自异域的音乐文化也丰富了文人雅士的艺术创作题材。唐诗中描写西域乐人、乐舞与乐器的作品不可胜数，其中不乏名篇力作，如白居易的《琵琶行》《胡旋女》、李贺的《李凭箜篌引》、李端的《胡腾儿》等。诗人或写琵琶声如急雨繁弦，或写胡旋舞回环如风，异域乐舞的节奏与情调化作诗意的声响与流动的画面。西域乐舞的律动为中华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激发更强的艺术张力。正如唐代诗人李颀在《听安万善吹笛（bi）箎（li）歌》中所写的：“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短短数句既点明乐器的来历，也写出了乐声传入中原后愈发奇妙动人的艺术魅力。

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与国家，通过丝绸之路实现了交流、融汇与包容。经由丝绸之路的文化视野，并逐渐为中原乐舞所吸纳、融合，丰富了中原古代音乐舞蹈文化，使异域乐舞最终融入中华乐舞文化，成为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同时，中原人在不断的迁徙与交流中，也将自身的音乐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域。黄釉扁壶作为东西方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物，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文化气度，以及海纳百川的文化自信。

（作者为河南博物院文博副研究员）
图①：陕西西安苏思勖唐代乐舞图壁画。 资料图片
图②：河南博物院藏黄釉扁壶。 河南博物院供图

精力都投入观鸟，并是一位长期观鸟纪录保持者；阿尔·莱万廷是一名化学博士，虽然嗅觉失灵，却在观鸟中追求完美，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格雷格·米勒尽管离异，但单身后的观鸟生活似乎带给他更多快乐，他以“穷游”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观鸟大年。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型观鸟活动的乐趣，更会被他们执著的探索精神打动。

书中人物的观鸟史，正是世界观鸟史和生态文明史的一部分。个人史本身就是公共史、社会史的组成方面，每个人的成长变化是社会缩影，每个人的经历也会在社会史中找到共鸣。读罢《观鸟大年》，我不由得回忆起自己的观鸟史。上世纪80年代，我拿着父亲从苏联给我买的望远镜开始在云天公园观鸟；1996年10月，环保社团“自然之友”在首都师范大学高武老师的带领下开始有组织地观鸟，我有幸参与其中。2009年，国家动物博物馆对外开放以来，每年春秋都组织观鸟活动，现在我们的足迹遍布东非、南非、东南亚、南北极、亚马孙等地区。

我国观鸟人群保守估计已达30余万人之多，实际上可能会更多。自然爱好者、鸟类爱好者也推动了如云南高黎贡山、盈江等地的观鸟产业，甚至极大拉动当地的文化旅游业。观鸟活动有益人民健康，这也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和文旅事业发展的新兴产业。

读完《观鸟大年》一书，我有一个展望：国家动物博物馆也可以组织我国的“观鸟大年”活动，让更多的人亲近自然，热爱观鸟！
（作者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利马的文明对话

袁若南

旅人心语

跨越半个地球，历经20多小时长途飞行，终于从北京抵达南美花园之城——利马。作为秘鲁首都，利马西近太平洋，东倚安第斯山，坐落在海滨沙漠绿洲之上。受秘鲁洋流影响，这里终年温和，即使潮湿多雾的冬季，平均气温也在17摄氏度左右，而3月的夏季平均气温则保持约22摄氏度，阳光明媚，鲜花盛开。

卡亚俄是利马的外港，也是利马—卡亚俄大都市区的一部分。驱车行驶在连接利马和卡亚俄的绿色海岸公路上，窗外海天一色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这条绿色海岸公路长近5公里，是集快速交通、景观绿化与海岸防护于一体的民生风景线。这条路由中国和秘鲁公司联合修建，缩短了从利马市区抵达卡亚俄的时空距离，解决了交通拥堵难题，成为中秘友好合作的生动缩影。

1537年，卡亚俄港由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所建，是秘鲁太平洋沿岸的最重要港口，也是南美洲重要的物流枢纽之一，承担着该国进出口货物转运的主要任务。卡亚俄最重要的历史遗迹是皇家费利佩城堡，它是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殖民地修建的最大、最坚固、最完整的军事防御工程之一。这座欧洲建筑风格城堡在卡亚俄奔涌的潮汐中矗立几百年，依然坚固，守卫着整个港口。漫步卡亚俄的海边、街道和城堡，既能感受到该港的独特经济价值，也能体会到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军事职能。

卡亚俄见证了中华文明与安第斯文明长达几个世纪的遥望与交汇，是中秘两大文明古国长期交往的重要见证。400多年前，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就曾延伸至此，拉开两国贸易、文化和人员交往的序幕。1849年10月，首批75名华工乘坐丹麦商船，经过艰难海上航行抵达卡亚俄。此后，越来越多的华人远渡重洋，经卡亚俄来到秘鲁谋生、创业。他们带来的中国文化与习俗也逐渐融入当地生活——城市里几千家中餐馆里独具特色的美食、中国农历新年期间的舞龙舞狮表演等，都吸引着当地居民与世界游客的脚步与目光。

1999年，为纪念华工抵达150周年，卡亚俄市政府竖起一座灰色的锥形纪念碑，上面铭刻：“谨此纪念抵达此一美丽海岸之华人移民先锋，由于彼等之努力

及奉献，对秘鲁农业、铁路兴建、乌肥开采及其后之商业发展贡献至巨，进而促进秘鲁之繁荣兴盛。”纪念碑位于公路旁一座主题公园内，这里绿树成荫，草坪修剪整齐，步道干净整洁。

来到利马旧城，方方正正的利马大广场铺着厚重的石头，身材敦实的鸽子在华丽的中央喷泉旁来回踱步。广场周围的总统府、利马市政大厦和大教堂等著名建筑仿佛一座露天博物馆，诉说着秘鲁历史的风起云涌与社会变迁。

喝一杯路边小商贩鲜榨的本地酸橙汁，继续前行。穿过利马大广场再拐两条街，就来到利马唐人街——卡蓬街，这也是拉美地区现存最古老的唐人街。入口处气势恢宏的牌楼上书“中华坊”，两侧各有一个威武石狮。街道内店铺林立，人流不息。地磚上的十二生肖图案、红色柱子的报亭、商铺中挂着的一串串红灯笼……林林总总的中国元素体现出华人的生活气息。如今，华人后代已融入当地社会，活跃在商界、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为社会发展贡献着力量。

利马是秘鲁的文化和教育中心，城内秘鲁国家考古人类学历史博物馆、秘鲁国家博物馆、利马艺术博物馆、秘鲁黄金制品和世界兵器博物馆林立，为参观者带来文化盛宴。2016年，“天涯若比邻——华夏瑰宝展”在国家考古人类学历史博物馆举办，121件（组）展品中既有纹饰精美的中国玉器与瓷器，也有工艺精湛的兵马俑与唐三彩，以及与中外交流有关的文物。国家考古人类学历史博物馆是秘鲁第一座博物馆，也是该国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最具代表性的博物馆。博物馆的明黄色墙体与精致的绿色镂空门窗巧妙融合了殖民时期和共和国时期的建筑风格。

漫步归来，发觉花园之城不止街头巷尾的繁花与绿意——它更是一座文化交融的精神花园。2026年是中国和秘鲁建交55周年，利马如同一本摊开的书，记录着两个文明古国跨越半个地球的相遇相知。回望过去，在那个航海条件极艰难、充满变数的年代，古朴的木船建立起文明的纽带，中国的丝绸与安第斯的白银，跨越万里相遇。如今，交通条件的提升，为更深层次的文明互鉴建立了基础。两大文明在太平洋的两端绽放更耀眼的光芒。作为秘鲁文化中心的利马，以朴素稳重的姿态告诉每位到访者：文明跨越山海，从不被距离阻隔。

下图：利马城市一隅。 袁若南摄



阿拉木图的百年木构

戎章榕

域外见闻

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中心的潘菲洛夫公园，色彩柔和的升天大教堂静静矗立。奶黄色外墙搭配薄荷绿与淡粉色的装饰，拜占庭式洋葱头尖顶错落有致，在正午阳光下泛着温暖光泽。远远望去，整座教堂秀丽典雅，既延续俄罗斯传统建筑的繁复美学，又融入中亚地区鲜明的色彩装饰艺术。

当地导游介绍，升天大教堂是“世界上现存第二高传统木结构建筑，且未用任何一颗钉子”，令我感叹其工艺之精巧。升天大教堂建成于1907年，整体高56米，采用无钉榫卯工艺。1911年，阿拉木图发生里氏8.2级大地震，全城90%的建筑化为废墟，唯独这座教堂主体结构完好无损，仅钟楼十字架略有变形，堪称奇迹。

可这座建筑为何采用榫卯结构？这源自建筑师安德烈·泽科夫的精心设计。阿拉木图地处欧亚地震带，在1887年和1889年两次经历强烈地震，城市中石构建筑大量倒塌。为此，泽科夫另辟蹊径，力排众议采用木结构，通过精密的榫卯拼接工艺增强建筑弹性和稳定性，在地震中有效吸收并分散能量，令大教堂在8.2级大地震中主体结构完好无损。

如今，升天大教堂已成为阿拉木图乃至哈萨克斯坦的标志性打卡地，吸引无数游客前来探寻建造奥秘。步入教堂正殿，富丽堂皇的装饰璀璨夺目。大殿墙壁上布满色彩鲜艳的绘画，生动再现故事场景；祭坛后的圣龛中，黄金镶嵌的塑像紧密排列，尽显庄严。仔细观察，竟然发现中国元素——青花瓷被用作装饰材料，实属罕见。这份独特的融合，正是阿拉木图这座拥有多元民族、不同文化的城市包容共生的最佳见证。

这座挺过地震考验的教堂也曾被改建为哈萨克斯坦中央国家博物馆，后又被各种公共组织使用。钟楼内甚至曾安装天线，成为阿拉木图首家广播电台的信号发射地。直至1976年，教堂首次进行修复，并于2017年再次修缮，才恢复往昔辉煌。

站在升天大教堂前，伸出手，仿佛能触碰时光的纹理。当阳光穿过彩色花窗，斑驳的光影在地面与墙壁上缓缓流淌，明暗交错间，竟生出几分与星空相望的浪漫与深邃。教堂里没有喧嚣的人潮，只有偶尔响起的轻声祷告和透过窗棂洒落的细碎日光。来到这里，无论谁都会放慢脚步，在静谧中默默阅读这份独特的百年建筑历史。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李欣怡
电子信箱：rnmrbgjk@peopledaily.cn
版式设计：蔡华伟

这个时代，我们更需要观鸟

张劲硕

阅见世界

在这个AI（人工智能）兴起的时代，人们愈来愈习惯使用各种AI工具，以便省时省力地完成工作，抑或提供生活上的便捷。毋庸置疑，我们应该欢迎AI时代的到来，也享受着它带来的高效、价值或收益。然而，越是在这样的时代，作为一名科普工作者，我愈加认为，我们更需要花一些时间拥抱大自然，接受阳光雨露的滋养，多去野外观赏一草一木、一鸟一兽。这种亲身体验是AI替代不了的，它对我们的身心大有裨益。其中，最有效且富乐趣的一项户外活动便是——观鸟！

今年2月23日，英国《新科学家》杂志刊载了一项研究。科学家发现，观鸟可以重塑大脑，构建抵御衰老的“缓冲带”。研究者使用了18种极易混淆特征的鸟类照片，在4秒内展示这些照片，让专业组和新手组人士分别识别这些鸟种。可以想见，专业组的识别准确率远高于新手组，而由这些人的大脑双侧前额叶皮层、双侧顶内沟、右侧枕颞皮层活跃度明显高于很少观鸟的人。这些区域与物体识别、

视觉处理、注意力与工作记忆等活动有关。科学家由此认为，常年观鸟有助于大脑健康，可减缓衰老。

我国有深厚的观鸟历史和文化基础，浩瀚古籍足以见证：《诗经》有许多篇讲到鸟兽虫鱼，“关关雉鸣，在河之洲”家喻户晓；许多唐诗宋词都与自然元素相关，存世的5万余首唐诗中，专门写鸟类的唐诗就有几千首；《山海经》《尔雅》《本草纲目》《古今图书集成》《鸟谱》……无不包含着对鸟类的细致观察与精确认知。

从文化角度讲，现代意义的观鸟起源于欧美。18世纪中叶，英国贵族群体开始乐于观鸟。后来随着望远镜的发明，使用望远镜去观察鸟类成为贵族的时尚乐趣。观鸟者也被称为“鸟佬”，西方的“鸟佬”着实不少，许多博物学家、科学家、鸟类学家。英国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等学者、作家便是早年著名的“观鸟达人”。当然，绝大多数“鸟佬”和科学专业毫无关联。

在美国，著名画家、鸟类学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将北美洲的鸟类观察推向不可思议的高度，其绘画作品至今被无数出版公司反复刊载。随后，一大批“鸟佬”推动了美国观鸟活动的发展。美国的“鸟类野外手册”是为佐证，在美国任何一家书店或网店



都可以找到多种观鸟工具书，细到一个州、一个县、一个区的观鸟手册。与之配套的大型活动也应运而生。1998年，美国观鸟协会正式推出“观鸟大年”：一年之内，在美国和加拿大境内的大陆或近海，凭借肉眼或望远镜目击鸟类种类汇报给该机构，凡记录种数最多者获胜。这项比赛虽然没有任何奖励，也没有裁判，全靠参赛者的诚实或信誉，但参与者甚众。

美国普利策奖获得者、著名记者马克·奥布马斯克撰写的《观鸟大年：人、自然和沉迷观鸟的故事》（见上图，资料图片）今年年初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刊行，并纳入“译文纪实”系列中。我读完本书，对“观鸟大年”活动有了深入了解。

桑迪·科米托是一位百万富翁，有钱有闲。他财富自由之后，将几乎所有